

岳父最后的日子

□陈建苗

前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我在单位开会,住在乡下的妻子打来电话:“父亲在家弯腰捡地面一小块石灰时(大概是房顶脱落的),坐倒站不起来了。”我赶紧问:“现在怎么样了?”她说:“大阿妹和大妹夫已送父亲去中医院拍片检查了,看看有没有骨折。”我想,上星期六的中午,岳父母还外出在饭店里和我们晚辈一起聚餐,那时他的气色、胃口和精神状态还都是很好的呀。

中饭后,妻子又来电话,说:“拍片检查结果出来了:右髌关节骨折。如需住院治疗,下午还要做B超检查和抽血化验。中午,父亲从中医院检查回家,还不让妹夫背着上楼,硬着要自己扶楼梯的栏杆一步一步走到四楼家里。”

听到“右髌关节骨折”,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老人髌关节骨折,俗称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五个月前,我母亲也是髌关节骨折动了手术。幸亏医生医术精湛,手术顺利,后来康复还好。这次岳父又是髌关节骨折,我忐忑不安地开车往岳父母家赶。

来到岳父母家,只见岳父神情自然地坐着,一点也看不出骨折后痛苦的表情。我走到岳父的身边,俯身摸摸他的右腿,问:“现在疼不疼?”他回答:“不疼。”妹夫对我说:“下午还要去趟中医院。中午他一定要自己走上来,就一顿饭的功夫,现在搀扶着都不会走了。有什么办法下楼送到医院去?”我想也没想就说:“我来背,你们帮我一把。”

我蹲下身,弯着腰,让岳父的两只手搭着我的脖子,岳母和妹妹夫在后面搀扶。但岳父不会配合,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子靠伏到我的背上。看似简单的事情,就是没有办法。

这时,我想到一位熟悉的骨伤科医生,给他打电话咨询。他听完我的讲述,说现在疫情肆虐,病房管理严格,如果骨折不是很严重,血小板又低,也可以考虑在家躺在医用病床上保守治疗。我们觉得也好,不去住院,家人照顾护理可能会更好一些。

买来医用病床,摇高床头,防止岳父吃饭和喝水呛着。开始几天,他的胃口不错,状态也很好。我暗自思忖:这样躺一个月,双脚试着落地,以后慢慢移步,三个月后可以康复了。并且看得出,他自己对康复也充满信心。

但是,到第五六天的时候,岳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:没有胃口,精神萎靡不振,甚至有些恍惚。我赶紧和医院联系,请医院速派救护车来。

救护车把岳父直接送到了重症病房,几位医生护士忙碌着,将各种医疗管子安插在岳父身上。我一时搞不明白,坐倒骨折一周还不到,怎么一下子病重到这个样子?医生诊断很快就出来了:重症肺炎,原因是卧床饮食引起的吸入性肺炎。

治疗方案很快就出来了。第一步先保命,治疗重症肺炎。第二步等病人状态恢复后,再动髌关节手术。

家里一旦有住院病人,会搞得手忙脚乱,身心疲惫。幸亏岳父母生了三个女儿,三连襟和三姐妹轮流探视和陪护。85岁高龄的岳母一定要自己去医院陪护,我们竭力劝阻,但就是劝不住,她说在家里住着也是不安心的。

开始几天,岳父神志不清。我们到病房探视,第一时间就会问岳父的胃口如何、吃了多少,再看监视器的数据,尤其是看血氧饱和度的高低,然后用手机拍下显示屏的

数据,发到大家庭群里。

经过十三四天的治疗,岳父的胃口好了,神志也清醒了。院领导会同骨伤科、麻醉科和重症科几个科室专家会诊以后,认为可以动全麻手术。我原来担心,岳父毕竟已是九十岁高龄,并且刚刚患了重症肺炎,至今还没有痊愈,动髌关节这样的大手术,他的身体吃得消吗?但如果拖着不动手术,又担心并发症。医生得出可以动手术的结论,我们内心既盼望又钦佩医生的技术和胆量。

动手术的那一天,我们扶着病床朝手术室走。我俯身握住岳父的手,对他大声地说:“主任亲自给您动手术,放心好了。”岳父微微点了点头,两眼含着泪光,流露出不舍的神情。

手术室的门像一道无情的屏障,隔开了我们和岳父的联系。

墙上的一块屏幕显示着手术病人的情况,当出现岳父的信息时,我会指给岳母看。怕她担心,我坐到她的旁边安慰几句:“去年上半年,我母亲也是髌关节骨折,手术也是主任动的,很顺利,后来康复也很好。”听我这么一说,岳母似乎淡定了许多。

一个多小时后,屏幕上出现了“术后”的字样,同时我的手机里收到了主任发来的微信:“手术顺利,请放心!”我赶紧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,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。

第二天早上,主任来查看病房,让岳父落地走走。我们搀扶着岳父,先缓缓地双脚落地,然后再慢慢地移了十几步。没想到,昨天刚刚动好手术,今天竟然可以落地走路了。主任交代,要坚持每天起床走走,这样恢复得快些。

可是到第三四天,岳父就是不愿下床走路。我们开始怪他不够配合、不够坚强,后来才知道是岳父年老体衰,没有力气。这样躺着不行,我们就劝他下床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。

术后的几天时间里,吸入性肺炎又发作了。有时夜里出现了谵妄症状,意识不清,烦躁不安。白天神志清醒的时候,他对我说:“住院了要告诉泗门镇的领导。”“好的,我会打电话的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想,岳父是一位本份的老干部,六七十年来,从不给组织添麻烦,这次倒是破例了。

岳父担任过余姚泗门区委委员,分管组织工作(后来撤区并乡,留在泗门镇工作)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毕业分配到泗门区下辖的一个公社工作,拿着介绍信先向区委报到,接待我的就是从没见过面的组织委员干同志(当时泗门区有个传统习惯,党内不叫职务,一律称同志,连区委书记大家都称他陈同志,叫的和应的都觉得亲切、自然,没有违和感)。这是我在工作上接触到的第一位国家干部,瘦长的个子,穿着整洁的灰色中山装,脸带微笑地握着我的手:“小陈同志,欢迎你到泗门区工作。”我递上介绍信:“干同志,区委有什么指示。”他只是简单地同我聊了聊,大意是尽快熟悉情况,适应工作,有事多请示汇报,等等。

刚参加工作,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而美好。我谦恭地听着,心里想着这位干同志像父辈一样,平易近人,没有官架子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干同志后来成了我的岳父。

那时,干同志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,跑泗门区下辖的七八个公社。公社干部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“干同志”,和他没有距

离,愿意找他聊聊工作,谈谈思想,所以他对全区的干部队伍甚至干部的家庭情况非常熟悉。

我所在公社的妇联主席是个热心人,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二年,她将干同志的大女儿介绍给我(她们住的地方相隔不远)。谈恋爱开始的一个月,我上门去女朋友家,见到她爸,习惯地称干同志,后来时间一长,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,才慢慢改口。

泗门镇的领导得知岳父病重住院,委派三位同志前来医院看望慰问。那天我不在。次日,岳父兴奋地告诉我:“昨天泗门镇领导来过了。”其实,平常每年泗门镇的领导都会上门慰问看望老干部,可他从来不会提起。这次他看得这么重,让我隐隐约约觉得,岳父在了却一份心愿——想生前最后一次见到组织上的人。

一天,轮到小姨子陪护,岳父对小女儿说:“我走了,不放心你妈,怕她寂寞,你给她买一部智能手机。”后来,小姨子买来手机后,岳父看了看,摸了摸,点点头,似乎心里踏实了。

镇里来慰问之后的两三天,岳父的状态还真不错,可过后胃口又差了,大半夜不睡,吵闹着要出院,自己拔管子,心疼住院花的钱。

记得住院前四个月的一天,岳父母曾让我们三连襟和三姐妹一起去家里商量一件事。岳母说:“老头子今年九十岁,我也八十五了。你们老爹提出来,要把一生的积蓄平分掉,每户二十万元,钱打到你们的银行卡里。”我们听后一直推辞,劝岳父母钱自己留着,不要省吃俭用,该吃吃,该穿穿,该买买。

其实,天下老人一个样,不论子女贫穷和富有,只想着身后多为子女留点财产。岳父身上穿的米黄色夹克衫,是我十五六年前买来自己穿的,穿了几天觉得不太合身,不穿了,妻子说让父亲穿着试试,结果他试着合身就穿到现在。

我们劝岳父生病了不要想省钱的事,况且大多数费用医保可以报销的。他听不进去,天天喊着要出院,要回家,回到泗门的家。其实岳父母在泗门镇的房子早在二十七八年前已经卖掉,这几十年一直居住在城区。

有人说,一个人老了以后,尤其到了生命的晚年,他最想念的是家乡,是出生的地方、成长的地方。

那天,岳母召集我们商量,说昨天夜里,老头子给我说要放手了……岳母对我们说:“我也反复考虑过,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,还不如让老头子走了。”大家听着,心情十分沉重,没有一个人出声。过了一会,我打破了沉默:“我们去问问重症室主任,看到底还有没有救。”主任耐心地告诉我们:“手术后站不起来,这一关过不了,肺以及其它器官会逐渐走向衰竭。但医生仍然会尽力的,最后的决定由你们做。”

岳父骨折住院救治已经四十多天,医生也是竭尽全力,但由于岳父年事已高,继续救治没什么希望。这样痛苦地拖延时间,也违背岳父的意愿。

岳父走的那一天,眼睛微闭只露一条缝,喉咙只能发出“哦哦”的声音。护士撤掉了安装在他身上的许多管子,只留一根鼻氧管。护工给岳父擦洗全身,换上了家里带去的内衣内裤(寿衣)。岳父“松绑”以后,几次抬起右手,摆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。临走前的大半小时,岳母和我们三连襟三姐妹围在岳父的病床两侧。此时的岳父,神态自然安详。我们看着他的脸,每个人都道:您放心走好了,姆妈我们会照顾好的。岳父抬起右手,缓缓地做了个“再见”的手势。

那年11月3日,岳父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告别了。